

“一带一路”视阈下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不完美改革

孙 博, 郑斯予

悉尼大学, 悉尼, 澳大利亚

收稿日期: 2022年8月29日; 录用日期: 2022年9月9日; 发布日期: 2022年9月29日

摘 要

“一带一路”地缘经济的发展增加了该区域内投资机会的同时, 也带来了更多的投资纠纷问题。但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作为解决国际投资纠纷的机制逐渐显现出了效率低, 费用高以及缺失透明度等问题。截至目前, 国际上对ISDS改革并未达成一致意见, 且每种改革措施各有利弊, 均不完美。中国在选择ISDS机制改革方式时, 应坚持ISDS渐进式改革, 并积极构建“一带一路”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构以及推广ADR机制以保障中国海外投资者的投资利益。

关键词

一带一路, ISDS改革, 国际投资, 仲裁

Imperfect Reform of Investment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under the Threshold of “One Belt, One Road”

Bo Sun, Siyu Zheng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Sydney, Australia

Received: Aug. 29th, 2022; accepted: Sep. 9th, 2022; published: Sep. 29th, 2022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ne Belt One Road” geo-economy has increased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in the region, but also brought more investment disputes. However, ISDS as a mechanism to resolve investment disputes between investors and host states gradually reveals its inefficiency,

high costs and lack of transparency. To date, there is no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on ISDS reform, and each reform measure has its own pros and cons and is not perfect. When choosing the ISDS mechanism reform, China should adhere to the progressive reform of ISDS, and actively build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dispute settlement institution and promote the ADR mechanism to protect the investment interests of Chinese overseas investors.

Keywords

One Belt One Road, ISDS Reform,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2013 年习近平主席提出旨在推动全球经贸治理体系变革,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带一路”伟大战略。中国秉持着“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在过去的 9 年里中国与 171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签署了 205 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1]中国与沿线国家投资合作程度逐渐加深, 但是在各国政治、文化、经济多样化的背景下, 投资者与东道国的纠纷不可避免。[2]

近年来随着交至“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ICSID)的案件增多, ISDS 耗时长, 费用高, 透明度低等问题逐渐暴露。[3]因此, 学界开始重视 ISDS 机制所暴露的缺陷并提出了许多不同的改进意见, 如 Anthea Roberts 认为 ISDS 机制改革方式主要有三种: 渐进式、系统性和范式改革[4]。即继续沿袭 ISDS 机制, 在此基础上进行改革, 如建立上诉机构[5]; 放弃现有的 ISDS 转而建立投资法院或者彻底废弃 ISDS 机制, 从而求助于国内司法体系。[6]此外, 建立“一带一路”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构以及专门的调解机构都有助于国际投资争端的解决。但是, 每一种改革措施都是不完美的, 也就是不能满足“一带一路”沿线所有国家的需求, 因此在所有不完美选项中取长补短, 逐步革新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是为上策。

本文拟从 ISDS 面临的困境出发, 首先, 分析目前 ISDS 机制的各种缺点, 如透明度低, 仲裁员公正性无法保证等。其次, 基于“一带一路”背景并结合“一带一路”投资风险特点, 进一步讨论主流的 ISDS 改革方式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影响。最后, 以中国为视角, 分析每一个改革方式的不完美之处, 并对改革方式的取舍提出建议。

2. ISDS 机制评述

国际投资争端主要矛盾集中在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 传统的国家之间的争端解决机制(如 WTO)不足以有效解决现存矛盾。ISDS 机制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2.1. 简述 ISDS 机制

ISDS 指的是投资者认为东道国违反了国际投资协定(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IIAs)中保护投资者利益的义务, 通过仲裁来解决投资争端的一种方式[7]。投资争端自人们有能力跨越边境运输货物开始便存在了。随着国际贸易的增加, 经济较发达国家更加希望将本国的资本或者商品输送到其他国家, 但是拉丁美洲、亚洲、非洲等地区国有化运动兴起让资本输出国犹豫在没有充分法律保证下继续对

外投资[8]。对于投资者来说, 在没有 ISDS 机制以前, 资本输入国对外国投资者的资产进行征收时, 一般只能通过东道国国内司法途径救济或者外交途径救济。如果选择东道国国内法院体系维护自身的权益, 出于对国内利益的保护, 法院可能不会完全按照公平原则来处理纠纷, 这不利于保障外国投资者利益[9]。因此, 投资者更愿意选择国际仲裁来维护自身权益而不是国内法院。[10]在 ISDS 的框架下, 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投资争端可以通过非东道国国民组成仲裁庭进行仲裁, 这个程序更加公平有效[11]。1958 年《纽约公约》的签署使得国外仲裁裁决对于签署国有了执行效力, 促进了更多投资者希望通过仲裁的方式维护自身权利。德国与巴基斯坦在 1959 年签订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BIT)第一次引入了 ISDS 条款, 之后附属于世界银行的独立机构 ICSID 以及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共同致力于制定 ISDS 规则并不断提出改革意见以减少投资者与国家之间的投资争端解决的政治干预从而在法律层面使 ISDS 机制更加公平[11]。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外来投资帮助本国发展经济, 而外国投资者在这个过程中也打开了东道国市场并有所盈利。ISDS 保护外国投资者权益并推动国际投资的目的与投资者和国家互利共赢的目标相契合[12], 因此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双、多边投资协定包含了 ISDS 条款。

在 1990s 以前, IIAs 几乎不涉及 ISDS, [13]之后伴随着外国直接投资(FDI)激增, IIAs 数量也快速增加[14]。截止到 2020 年一共签订了 3360 个 IIAs [15], 而其中大部分的 BITs 都采用了 ISDS 来解决投资争端[14]。2020 年 ISDS 案件量已经达到了 1104 件[16]。

2.2. ISDS 的缺陷

2.2.1. 透明度低与仲裁裁决缺乏一致性

虽然仲裁是一个有效保护外国投资者免受国内法院不公正对待的方法, 同时“一裁终局”的高效率和保密性较高可以保护“商业秘密”这两个特点是仲裁对于司法的优势, 但这同样为解决投资者与国家之间的纠纷带来了困扰。在投资者和国家投资纠纷中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是不可分割的, 国际投资仲裁具有个人物品的特征, 是由契约和市场力量所支配的, 特别是从仲裁员任命上可以体现; 同时国际投资仲裁也具有“公共物品”的特点, 仲裁结果要保护公共利益, 因为仲裁内容与一国公民利益息息相关[17], 因此“商业秘密”在 ISDS 中不应该具有核心地位。2007 年, 玻利维亚以透明度不高为理由向 ICSID 提交了退出声明, 此后厄瓜多尔等国家也退出了 ICSID, 由此对于透明度的担忧达到临界点[18]。在 ISDS 机制中, 透明度与信息公开, 仲裁通知, 相关程序文件及其提交和最终的裁决都有关系, 也就是说, ISDS 存在着不公开程序文件, 诉讼过程保密, 公民很难得知仲裁信息等弊端。[19]

尽管关于透明度的规则已经被包含在了许多 IIAs 中, 比如欧盟与新加坡等国的贸易协议等, UNCITRAL 第三工作组报告中也对透明度问题进行了强调, 对于如何提高 ISDS 中的透明度也在不断尝试改革[20], 但效果不明显。透明度不高不仅仅影响信息公开, 还会降低仲裁结果的可预测性和一致性。导致仲裁裁决缺乏一致性的原因有很多, 比如, 仲裁基于不同的投资规则, BITs 规定较为模糊和陈旧, 以及不同的仲裁机构得出的结果可能不一样。但是, 透明度依然是造成仲裁结果可预测性低的重要原因。在投资仲裁中, 判例的作用显著。尽管 ISDS 的裁决对于之后的仲裁庭没有约束力, 但维持裁判的稳定性也是仲裁员的责任, 仲裁员无法及时获得之前的判例使得仲裁员在处理类似案件时无法在参考先例的情况下审理案件, 加之仲裁员对于同样条款的解释会采用不同方法, 导致结果出现差异甚至相反。[21]

2.2.2. 诉讼成本过高

ISDS 的成本分为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2014 年 Daniel 教授曾对部分案件诉讼时常进行过统计, 在其收集的案件中平均诉讼时常达到了 48.9 个月, 申请人胜诉的案件平均时长高达 55 个月。尤其在遇到特殊情况下, 诉讼时间超过了 129 个月, 时间成本及其巨大[22]。金钱成本可以大致可分为调解阶段费用,

仲裁庭费用, 律师费以及裁决之后赔偿的费用等。早在 1960 年, Seidl-Hohenveldern 主张“国际仲裁比常设的外国投资法院更有优势, 特别是其费用较低更吸引外国投资者。”[23]但随着投资仲裁的发展, 仲裁的费用逐渐升高。根据 UNCITRAL 第三工作组的报告, ISDS 案件中每一方当事人平均花费在 800 万美元以上最高的可能会超过 3000 万美元[24]。仲裁庭的费用(主要包括支付给仲裁员的费用和仲裁程序的相关费用)是整个仲裁过程中费用较小的一项, 然而据统计 NAFTA 的仲裁庭费用大约在 100 万美元到 300 万美元之间, ICSID 案件中仲裁庭费用大约 104 万美元, UNCITRAL 仲裁费用也要在 140 万美元[14], 这些费用对于投资者来讲也是不小的花费。除此之外律师费、专家证人等费用对于双方当事人也是颇为昂贵。

2.2.3. 仲裁员缺乏公正性

ISDS 仲裁都是临时组成, 根据 ICSID 仲裁庭组成规则, 一般情况来说仲裁庭由三人组成, 当事人双方一方指定一名仲裁员, 第三名双方协议选定或者仲裁中心指定[25]。ISDS 仲裁继承了国际商事仲裁, 仲裁员与国内法院的法官不同, 一方面他们没有义务去维护东道国的宪法及法律, 因此许多学者担心仲裁会赋予外国投资者更大的权利去挑战东道国的公共利益甚至危害国家安全。另一方面, 法院的法官大多都是终身制或者长期任职, 但是 ISDS 仲裁庭中的仲裁员许多都是律师, 当事人需要付给他们高昂的仲裁费用。仲裁员接受任命以后难免会对其“雇主”更加用心, 从而维持长期的业务[11]。此外, 仲裁员的费用在时薪 600 美元以上, 这种情况下遇到不符合仲裁标准的案件, 仲裁员也不会立刻驳回案件[26]。同时, 由于仲裁的私密性, 仲裁员不必像法官一样对公众负责, 这对于东道国的公共利益的保护会造成威胁。

2.2.4. 其他缺陷

调解无论在法院诉讼还是仲裁中都是重要的一环, 这原本是弥补仲裁低效率, 节省仲裁费用的有效办法。但根据 ICSID 的数据截止到 2021 年一共有 11 個案子通过调解结案, 可见调解在实践中运用较少[27]。除此之外, ISDS 还缺少上诉机制, 目前根据《关于解决国家和其他国家国民投资争端公约》(《华盛顿公约》)仅能对仲裁进行程序审查, 对于仲裁结果的正确与一致性还不能进行实质性审查。

3. “一带一路”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多元化改革

对于投资者, 构建多元化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可为其在结合案件实际情况在多种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中选择一种最优方式从而和平, 公正和高效的解决投资争议创造可能。对于中国而言,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 坚持推动多元化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发展在为本国投资者保驾护航的同时, 可进一步保障国家利益。

3.1. 推进 ICSID 改革

中国于 2019 年 7 月向 UNCITRAL 第三工作组提交了《中国关于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建议文件》, 声明了中国立场。中国认为: “尽管 ISDS 机制存在缺乏纠错机制, 缺乏稳定性和可预期性等问题, 但是投资者与国家间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仍是解决相关问题的重要解决方法, 应通过改革积极完善, 增强当事方对该机制的信心。”[28]在尚未构建“一带一路”专门投资争端解决机构的情况下, 对 ICSID 进行渐进式改革有助于解决我国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投资争端的解决并可为日后建立专门争端解决机构打下基础。

3.1.1. 设立仲裁上诉机构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 ISDS 仲裁结果逐渐倾向于外国投资者。国家有义务平衡外国投资者和国家

利益, 过度保护投资人有违公平原则[29]。投资争端的公法属性使其区别于商事仲裁, 因此“一裁终局”的特征也不能适应投资仲裁。商事仲裁满足仲裁双方对高效率, 保护商业秘密的要求, 但是在投资者和国家投资争端中, 投资者的利益与东道国国家利益需要给予同等保护, 甚至出于保护人类健康、世界环境的考虑, 应重点保护公共利益。基于此, 设立 ICSID 上诉机构有利于平衡当事方利益。早在 2004 年 ICSID 秘书处就提出了设立仲裁上诉机构的想法。UNCITRAL 第三工作组对于建立上诉机构的运营提出了多种议案, 其中包括上诉的审查范围, 可上诉的情形, 上诉效力以及时间期限等等[30]。在设计 ICSID 上诉机构时, 可以借鉴 WTO 上诉机构的模式。例如, 上诉机构由 3 或 7 人构成并将一审仲裁员和上诉机构人员相分离。规定严格时间限制从提起上诉到作出决定在 12 个月以内。上诉审查的范围也不必将全案重新审查, 仅就“法律错误”和明显的事实错误进行审查即可。同时, 要发挥 ICSID 秘书处的作用, 这也是确保 ICSID 争端解决程序和结果一致性的重要一环[31]。

3.1.2. 提高 ICSID 的透明度

自 2006 年修改 ICSID 仲裁规则开始, 提高透明度变成了 ICSID 改革的趋势。第一, 应公开仲裁结果和其他不涉及当事方利益的法律文件。ICSID 公约和仲裁规则并没有反对当事方公开自己的法律文件。如果为了保证仲裁过程的完整性, 在仲裁尚未结束时, 仲裁庭可以根据当时双方达成的协议进行部门文件的公开, 在仲裁结束以后公开相关的仲裁结果和相关文件[32]。第二, 允许第三方参加仲裁。“法庭之友”作为第三方参加仲裁一直争议不断, 但综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情况, 引入法庭之友可以更好推动投资争端的解决。首先, 沿线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 部分国家法律制度不够完善, 法治建设较为落后, 在仲裁过程中不能提供仲裁庭需要的信息去论证所持观点, 第三方的参与可以为当事方提供法律和技术帮助以此来保护公共利益[33]。其次, 法庭之友的参与可以帮助公民监督仲裁的进行, 提高仲裁的透明度, 最大程度的保证公共利益不受侵犯。

3.1.3. 保证仲裁员的公正性

在投资者国家投资争端解决过程中, 仲裁员选任事关裁判的公平性。从 2017 年, UNCITRAL 工作组在对 ISDS 是否可能进行系统性改革进行调查中提出了仲裁员具有偏见的问题到 2021 年第三工作组第四十届会议中提出了仲裁员选定的方法, 关于仲裁员任命的问题一直处于争论和探讨中[34]。目前仲裁员的任命暴露出来两个问题。第一, 当事方有权利干预仲裁员的任命。当事人在指定仲裁员的时候都希望仲裁员可以偏向自己。第二, 仲裁员的选任往往都在少数人群中确定, 很多仲裁员都会被反复任命, 基于业务考虑, 仲裁员可能会有失公平。作为仲裁的初始环节, 仲裁员的选任直接决定仲裁是否公平。有学者认为, 现有仲裁员的选任方式并不是直接促使仲裁员偏向投资者或者国家的直接诱因, 但确实不能否认仲裁员为了所谓“公平中立”的名望会做出自己明知不正确的决定。[35]因此对于修改 ICSID 仲裁员任命机制是必要的。首先, 禁止当事人指定仲裁员。仿照法院指派法官的模式, 由仲裁中心秘书处选派仲裁员可以避免仲裁员基于“雇主”压力作出不公正的结果。其次, 改变反复任命仲裁员的现象。被反复任命的仲裁员即便没有作出偏袒某一方的决定也会引来质疑, 基于此, 应建议当事人多关注未被任命的国际仲裁员, 积极选用女性和发展中国家的仲裁员[36]。同时可以对于同一仲裁员两次任命规定时间限制, 不可以连续被选任, 这样一来也可以减少仲裁员的商业化因素。

3.2. 构建“一带一路”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构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推进以及亚投行业务全面开展, 投资者面对有可能继续增加的投资风险, 目前没有一个可以完美解决投资争端机构, 因此中国可以本着“一带一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和为他国着想的大国风范主导建立“一带一路”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构。

“一带一路”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构的构建是应分别设立“一带一路”调解机构和仲裁机构, 还是应整合资源设立一个磋商、调解和仲裁等多元解决方法为一体的争端解决机构? [37]对于仲裁来说, “一带一路”区域内已经存在香港国际仲裁中心, 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还有中国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等, 若再建立专门的仲裁中心会导致机构冗杂。调解和磋商更适合做一个前置程序无需设立专门机构, 否则也会增加当事双方的费用, 增添解决争端的障碍。

建立统一的“一带一路”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构应秉持以下重要原则。[38]第一, 明确管辖范围。ICSID的设立是为了弥补世界银行业务不足, 同样亚投行的业务也可以由“一带一路”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构来补足。[39]同时, 对于受案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包括银行与客户之间, 投资人与国家之间以及投资者之间的纠纷, 应能受理解决“一带一路”框架下所有投资争端。第二, 完善组织架构。争端解决机构应设立专门的权力、管理, 执行和服务等部门, 可设立理事会和秘书处处理机构和当事人的日常事务。同时配合调解和磋商程序, 应设立专门人员负责该程序, 保证磋商和调解不再是形同虚设。由于该机构服务于“一带一路”战略, 对于成员加入和退出应持开放态度, 建立《“一带一路”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公约》并欢迎更多的国家和机构的加入。[39]

3.3. 加强 ADR 机制的运用

诉讼与仲裁本身具有对抗性, 当事人双方在此过程中必然会牺牲部分利益。然而, 发展中国家引进外国投资的目的是互利共赢, 外国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取得经济收益, 同时也为东道国提供了就业岗位、资金扶持和新兴技术, 追求输赢并不是投资的初衷。替代性解决争议的方法(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DR)一般包括: 谈判、斡旋、协商和调解等方法, 考虑到“一带一路”的宗旨和沿线国家的特点, 推广ADR在解决投资争端方面许多优势。第一, 沿线国家大多都是发展中国家, 采用协商、调解的方法可以防止国家陷入诉累, 提高问题解决的效率。第二, ISDS机制中仲裁员的选任一直以来备受诟病, 仲裁员的倾向性导致当事方对于仲裁结果不能完全信服。ADR以调解为主, 在第三方的主持下经过双方同意, 最终达成一个双方满意的结果。[40]这有利于推动双方对结果的接受程度, 又便于调解结果的执行。第三, ADR形式多样, 具有很好的灵活性和经济性。[41]在英格兰法院, 法官认为案件适合ADR时, 会鼓励当事人通过非诉讼方式调解结案, 以此来降低诉讼成本, 减轻当事人负担。在中国现行司法制度中, 诉前调解也是部分诉讼中必经步骤且效果明显并受到案件当事人的支持。因此推广ADR对于保护东道国及其民众利益和投资者私人利益都具有积极意义。

在“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构建中, ADR机制的设计可以借鉴WTO争端解决机制。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Understanding on rules and procedures for dispute settlement, DSU)第四条规定“在案件提交专家组之前要进行强制性磋商, 并规定可以选择使用斡旋, 调解等程序。”中国对于现行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也提出了具体的改革建议, 其中包括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进行3到6个月的强制性磋商。同时可效仿新加坡司法体系, 即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 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和新加坡国际调解中心各部分相互协作。[42]在建立“一带一路”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构时, 不必要单独分立仲裁中心和调解中心, 但是可以在统一机构内分立部门或者由秘书处组织有专门知识的人负责调解, 以此降低ADR机制的成本, 使得其在争端解决过程中随时使用。

3.4. 谨慎选择多边投资法院

2015年9月欧盟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中提出了一项ISDS机制“系统改革”的新计划, 该计划提出了构建投资法院体系(International Court System, ICS)。投资法院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进投资仲裁中缺乏上诉机制, 透明度低, 裁决不一致的弊端, 但投资法院的建立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双边投资法院的增加会导致 ISDS 机制程序冗杂。[43]这些会导致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成本增加的同时, 也会使国际投资法碎片化。因此, 欧盟将双边投资法院作为建设多边投资法院(Multilateral Investment Court, MIC)的中转站, 在双边投资法院改革的同时也在推进 MIC 的构建。[44]欧盟的 MIC 是基于 ISDS 机制的系统性缺陷所提出的, 一度被认为是 ISDS 改革的最佳方案。

MIC 确实在解决投资争端问题上有制度优势, 但弊端也同样存在。比如 Lukasz Kulaga 认为“重新创建 MIC 执行制度是有必要的”。[45] MIC 并非像仲裁那样基于当事人高度的自治权, 因此学界对于能否通过《纽约公约》进行执行一直存在争议。同时各国对 ISDS 机制的改革模式一直存在分歧, 短期内实现 MIC 的构建实属不易。中国对于 ISDS 仲裁机制较为熟悉, 但是对于欧美国家主导的投资法庭经验不足, 特别是我国国际法律人才与西方国家相比储备不足, 对于规则的把握上欠火候。结合 MIC 制度的优势以及中国自身特点, 我国应坚持 ISDS 机制“渐进式”改革立场, 同时着眼于未来, 在研究 MIC 构建时要站稳中国立场, 积极发出中国声音, 等待 MIC 完善后予以引进推广。[44]

4. 结语

无论是继续完善 ICSID 还是设立“一带一路”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构, 每一种方式都有助于促进“一带一路”沿线投资的长久稳定发展, 有利于推动国际投资争端的解决, 同时也有益于中国在全球治理和规则重构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但是考虑到沿线每个国家的法治水平不同, 对于投资者的保护能力也不能一概而论, 并且外国投资者也要进行小中规模和实力雄厚跨国投资者的区分, 建设统一的争端解决机制当前来讲并不是最好的选择。现阶段所有的改革方式都不是完美的, 因而中国在推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时, 应结合自身特点, 对改革措施进行多重选择, 并取长补短。一方面, 多种改革措施之间可以相互协调, 互相配合, 比如投资者与东道国可以根据纠纷的实际情况选择仲裁或调解, 这样可以尽可能高效地解决投资纠纷。另一方面, 在改革现有 ISDS 机制时, 多种改革方式共同推进有利于中国把“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落实在“一带一路”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体系的建设中, 即大力推广 ADR 模式, 倡导沿线国家在遇到投资争端时以协商、调解为首要方式, 并且积极主持创建“一带一路”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构, 同时关注 MIC 建设以期实现多种机制协同治理, 高效解决投资争端问题。

参考文献

- [1] 2020 年我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情况[EB/OL]. <http://fec.mofcom.gov.cn/article/fwyydl/tjsj/202101/20210103033338.shtml>, 2021-01-22.
- [2] 杨松. “一带一路”下国际投资争议协同治理机制的构建[J]. 国际法学刊, 2019(1): 85-105+167.
- [3] Kofman, M. (2018)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Challenges and Reforms. *Australian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25, 49-62.
- [4] Roberts, A. (2018) Incremental, Systemic, and Paradigmatic Reform of Investor-State Arbitr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12, 410-432. <https://doi.org/10.2139/ssrn.3189984>
- [5] Puig, S. and Shaffer, G. (2018) Imperfect Alternatives: Institutional Choice and the Reform of Investment Law.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12, 361-409. <https://doi.org/10.1017/ajil.2018.70>
- [6] Reading Guide.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MEMO_15_5652
- [7] Nichols, S. (2019) Transnational Capital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tate: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 in the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 *Critical Sociology*, 45, 137-157. <https://doi.org/10.1177/0896920516675205>
- [8] Alvarez, J.E. and Alvarez, P.J.E. (2011) The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Regime Governi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Brill, Leiden. <https://doi.org/10.1163/9789004249936>
- [9] Kang, T. (2020) Problems of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 *Journal of Advanced Research in Law and Economics*, 10, 561-564. [https://doi.org/10.14505/jarle.v10.2\(40\).16](https://doi.org/10.14505/jarle.v10.2(40).16)
- [10] Butler, N. (2019) Non-Disputing Party Participation in ICSID Disputes: Faux Amici? *Netherlands International Law*

- Review*, **66**, 143-178. <https://doi.org/10.1007/s40802-019-00132-8>
- [11] Osmanski, E. (2018)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 There a Better Alternative? *Brookly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43**, 639.
- [12] Wang, C.Y. (2021) Mine-Golia: Integrated Perspectives on the History and Prospects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the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Regime. *New York Univers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 Politics*, **53**, 631-687.
- [13] Investment Dispute Settlement Navigator. <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investment-dispute-settlement>
- [14] Samples, T.R. (2019) Winning and Losing in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American Business Law Journal*, **56**, 115-175. <https://doi.org/10.1111/ablj.12136>
- [15] Key Messages,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3 (2021).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WIR2021_key-messages_en.pdf
- [16]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21. <https://worldinvestmentreport.unctad.org/world-investment-report-2021/ch3-investment-policy-developments>
- [17] Michaels, R. (2020)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s Private and Public Goo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https://doi.org/10.1093/law/9780198796190.003.0016>
- [18] Kenny, W. (2016) Transparency in Investor State Arbitr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33**, 471-500. <https://doi.org/10.54648/JOIA2016036>
- [19] Luque Macías, M.J. (2016) Inter-State Investment Dispute Settlement in Latin America: Is There Space for Transparency? *The Journal of World Investment & Trade*, **17**, 634-657. <https://doi.org/10.1163/22119000-12340007>
- [20]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Reform on the Work of Its Thirty-Ninth Session (Vienna, 5-9 October 2020). <https://undocs.org/en/A/CN.9/1044>
- [21] 陈江滢, 葛顺奇. 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与中国对策[J]. 国际贸易, 2021(1): 47-56+82.
- [22] Behn, D. (2015) Legitimacy, Evolution, and Growth i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Empirically Evaluating the State-of-the-Art. *Georgetow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46**, 363.
- [23] (1960) Juridical Aspects of Nationalization and Foreign Property. 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 Reports.
- [24] UNCTAD (2018) Working Group III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Reform) Thirty-Sixth Session.
- [25] Convention of ICSID IV. <http://icsidfiles.worldbank.org/icsid/icsid/staticfiles/basicdoc/partA.htm>
- [26] (2014) The Arbitration Game;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The Economist (London)*, **413**, 78.
- [27] Case Database of ICSID. <https://icsid.worldbank.org/cases/case-database>
- [28] 投资人与国家间争端解决制度可能的改革中国政府提交的意见书[EB/OL]. <https://uncitral.un.org/sites/uncitral.un.org/files/wp177c.pdf>, 2019-07-18.
- [29] Sweet, A.S., Chung, M.Y. and Saltzman, A. (2017) Arbitral Lawmaking and State Power: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Investor—State Arbitr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8**, 579-609. <https://doi.org/10.1093/jnlids/idx009>
- [30] Possible Reform of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 Appellate Mechanism and Enforcement Issues. <https://undocs.org/en/A/CN.9/WG.III/WP.202>
- [31] Mcrae, D. (2010) The WTO Appellate Body: A Model for an ICSID Appeals Facil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1**, 371-387. <https://doi.org/10.1093/jnlids/idx003>
- [32] Reinisch, A. and Knahr, C. (2007) Transparency versus Confidentiality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The Biwater Gauff Compromise. *The Law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6**, 97-118. <https://doi.org/10.1163/156918507X193131>
- [33] Dias Simões, F. (2017) Friends with Benefits? Amicus Curiae in the TPP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Springer, Singapore, 105-128. https://doi.org/10.1007/978-981-10-6731-0_7
- [34] Possible Reform of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Selection and Appointment of ISDS Tribunal Members. <https://undocs.org/zh/A/CN.9/WG.III/WP.203>
- [35] Rao, W. (2021) Are Arbitrators Biased in ICSID Arbitration? A Dynamic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 and Economics*, **66**, Article ID: 105980. <https://doi.org/10.1016/j.irle.2021.105980>
- [36] Coleman, C. (2016) How International Is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Dispute Resolution? Exploring Party Incentives to Expand ICSID Arbitrator Demographics. *Transnational Law & Contemporary Problems*, **26**, 121.
- [37] 廖丽. “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创新研究——国际法与比较法的视角[J]. 法学评论, 2018, 36(2): 166-173.
- [38] 王祥修. 论“一带一路”倡议下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J]. 东北亚论坛, 2020, 29(4): 15-26+127.

- [39] 张丽娜. “一带一路”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完善研究[J]. 法学杂志, 2018, 39(8): 32-42.
- [40] Collins, D. (2012)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for Stakeholder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15**, 673-700. <https://doi.org/10.1093/jiel/jgs019>
- [41] 郭一恒.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中亚区域性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策略[J]. 对外经贸实务, 2020(8): 45-48.
- [42] Titi, C. and Gómez, K. (2019) *Mediation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nd Investment Disput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 [43] Lee, J. (2018) Mending the Wound or Pulling It Apart? New Proposals fo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Courts and 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Northwester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 Business*, **39**, 1-35.
- [44] 李佳, 吴思柳. 双边到多边: 欧盟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和中国选择[J]. 国际贸易, 2020(9): 46-53.
- [45] Kulaga, L. (2018) A Brave, New,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Court in Context: Towards a Paradigm Shift of the ISDS. *Pol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38**, 115-140.